

解读台州经济

主 编 马章良

副主编 杨林生 余雪锋

Interpretation of Taizhou Economy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解读台州经济

主 编 马章良
副主编 杨林生 余雪锋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台州经济 / 马章良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141 - 6617 - 0

I. ①解… II. ①马…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 - 台州市 -
文集 IV. ①F127. 55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6623 号

责任编辑: 段 钢

责任校对: 刘欣欣 刘 昕

责任印制: 邱 天

解读台州经济

主 编 马章良

副主编 杨林生 余雪锋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0. 5 印张 750000 字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617 - 0 定价: 76.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言

台州是股份制经济的发源地，是中国当前两大经济模式之一的“温台模式”的创始者。民营经济在台州经济总量中占比 97% 以上，大大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与之相匹配的是台州雄厚的民间资本和发达的金融业。台州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如医药化工、汽摩配、缝制设备、造船、先进装备制造等。台州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台州经济的发展，也极为重视对台州经济开展研究。

在台州市社科联及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2009 年 12 月正式成立台州经济研究所，同时组建了研究所领导机构和学术委员会。研究所积极开展对台州经济的研究，其中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浙江省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浙江省社科联重点研究项目、浙江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研究项目、台州市重大委托项目等达 30 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市厅级课题研究 50 多项。在《国际贸易问题》、《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达 80 余篇，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研究所成员发表的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从各个方面对台州经济进行深度解读。为了更好地解读台州经济，展示台州经济研究所研究的科研成果，我们现将论文分为以下七个模块汇编成册，即宏观经济、产业经济、民营经济、开放经济、农业经济、金融经济、管理经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依托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台州市社科联领导的悉心指导，还得到了有关单位的无私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对经济科学出版社及其编辑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也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5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绩效的阻滞与超越

——基于中国发展的制度经济学阐释	杨林生	杨德才	3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二维度阐释			
——基于经济性质关系与经济运行关系的分析	杨林生	论卫星	13
资本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工资机制研究	论卫星	杨林生	22
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相关性研究			
——基于 Copula 函数	余雪锋		33
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马章良		44
我国服务贸易产业安全与管理研究	余雪锋		54

第二部分 产业经济

台州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马章良		63
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耦合研究			
——以台州为例	王 巾		73
传统产业集群联盟标准的形成动因	张 帆		78
产业关联互动视角下的商品专业市场发展			
——基于台州市路桥区的实证研究	邵丹萍	严先锋	8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模具产业集群园区创新体系研究			
——以台州模具产业集群园区为例	马章良	马仁秒	96
基于产业融合的文化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朱 蓉		105

联盟标准对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机制

——以仙居木制工艺品联盟标准为例	张 帆	114
构建浙江区域创新体系之研究	朱 蓉	122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马章良	129

第三部分 民营经济

以人为本 构建台州中小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	许世亮	141
民营企业人工成本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徐丹琦	146
台州民营出口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初探	许世亮	156
中小型民营企业 ERP 系统建设流程探析	范真荣	162
民间借贷危机下浙江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对策研究	朱 蓉	168
小微企业成长发展影响因素评价分析		
——基于浙江省台州市企业的调研	张 靖	174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分析		
——基于台州的视觉	刘锦霞	183
后金融危机时期台州民营出口企业品牌营销初探	许世亮	189
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动机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	刘锦霞	195
中小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对策		
——基于台州市品牌创新	许世亮	203

第四部分 开放经济

中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	余雪锋	213
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培育路径研究		
——以台州市为例	朱 蓉	224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马章良	229
后危机时代价值尺度下的出口物流量研究		
——以台州市为例	章文燕	239
FDI 对中国服务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马章良	253
中国对外贸易与行业收入分配不均的实证研究	张 懿 余雪锋	262
全球化视角下的浙江省对外开放战略	马章良 郑雪英	271
浙江省 FDI 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马章良	278
基于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的中国 16 个环渤海经济圈城市利用外资比较研究		
.....	余雪锋	290

FDI 对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马章良	301
---------------------------	-----	-----

第五部分 农业经济

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属性及其企业化升级	杨林生	论卫星	311
中美大豆期货价格相关性研究			
——基于 Copula 函数	李显戈	周应恒	随学超 320
台州农产品出口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	阮建女		330
外部冲击对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分析	李显戈	周应恒	336
农业散户与农业大户间土地流转障碍探析	论卫星	杨林生	343
隐形贸易战视角下台州市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对策研究	阮建女		354
中国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李显戈	周应恒	360
玉米期货价格的波动分析	李显戈	周应恒	371
应急处置诉求下的台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阮建女	包宏进	379
低碳农业双重发展取向与实现路径选择	张颂心	严先锋	385

第六部分 金融经济

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约束与对策建议			
——基于浙江省台州市的调研	杨林生	杨德才	393
民间借贷危机下温台区域融资渠道创新研究	朱 蓉		406
我国民间借贷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吴伟萍	吴 杰	412
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现状、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马章良		421

第七部分 管理经济

基于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框架下的人力资源会计研究	徐丹琦		429
非市场价值评估手段及应用研究	李显戈		438
母公司对子公司财务控制困境的博弈分析与破解探索	陈天灯		445
浙江台州民营企业企业家素质调查	刘锦霞	雷敏君	455
商会的信用研究综述	严先锋	张颂心	463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台州物流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章文燕		469
构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研究	陈天灯		475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绩效的阻滞与超越

——基于中国发展的制度经济学阐释^①

杨林生^② 杨德才^③

【摘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绩效理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绩效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何种制度安排便会有何种经济增长绩效。对“李约瑟之谜”及“中国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探寻制度、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绩效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对“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观点纷呈，无论是官僚体制的阻碍，还是产权体系的缺失乃至意识形态的延滞，就其核心而言，症结在于制度绩效的低下。而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正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通过供给和变迁来挖掘增长潜力进而解放生产力的过程，通过基于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交易成本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安排的激励效应，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制度红利不断显现。然而，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不难发现，不仅制度因其绩效有高下之分而非万能的灵丹妙药，而且后发国家也不能完全复制别国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绩效；李约瑟之谜；中国改革；制度红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绩效理论，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绩效。一个社会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之所以表现为衰落或进步，其根本原因是其前的制度安排决定的，因此，历史是经济学家获取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这里不妨以“李约瑟之谜”与“中国改革”为例，对制度、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绩效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一、李约瑟之谜：揭开历史的面纱

中国“在公元3~13世纪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其富庶程度也是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然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现代科学为什么也无缘诞生于中国？前现代中国为什么又会急剧衰落？这些是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

① 基金项目：2013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浙江人经济”的制度经济学阐释》（编号2013B056），主持人：杨林生。

② 杨林生（1972-），男，江西九江人，台州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③ 杨德才（1965-），男，安徽马鞍山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瑟 (Joseph Needham) 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等论著中提出的一系列的疑惑,被学界称之为“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谜底是什么?长期以来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试图揭开历史的面纱,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想去破解这个谜。有人认为是中国小农经济阻碍劳动分工引起的,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规避风险的思想导致的,还有人认为是中国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造成的。对于“李约瑟之谜”可能的解有许许多多,各种观点交汇纷呈又莫衷一是,制度经济学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都是制度惹的祸。

(一) 以官僚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的阻碍

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李约瑟本人也进行了探究与求证,认为中西方封建政治体制的差异才是其根本所在。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主要作为灌溉体系的维护者不同,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则十分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当贵族势力没落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便应运而生。虽然早期的中国官僚体制较好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但它却阻滞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故而终究未能把工匠的技能与学者的数学及逻辑推理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科技发展及其与工商业活动结合落伍于欧洲。概括李约瑟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种的结论:正是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及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经济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动力和活力。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中也分析了官僚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他认为,虽说官僚体制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正面而积极的,但其对在农业之外的经济影响却明显是负面而消极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豪绅大多只对地租有浓厚的兴趣,但同时他们又控制着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阻止着那种欧洲模式的独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难以得到安全保障的,企业“任何有可能牟利的活动都受制于官僚的盘剥。稍大规模的企业活动仅限于国家或公开许可的某些垄断机构。任何试图利用中国精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来进行有利可图的海外贸易活动,是根本禁止的。”此外,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还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论”的观点的形成,进而造成了“对中国以外的发展采取冷漠的态度”。

(二) 以产权体系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缺失

探寻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缘由,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的根源。道格拉斯·C. 诺思 (Douglass C. North) 首先否认了工业革命是英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认为它只是当时经济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迹象而已。在他看来,英国能够爆发工业革命是与它漫长的制度变迁和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英国持久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英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以前已建立了包括专利

制度在内的有效的所有权体系（如1624年英国颁布的专利法性质的《独占法》），随后不断完善和推进保护私人所有权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对照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不仅没有建立边界清晰的私有产权，而且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能工巧匠及技术发明的贡献与人口的数量呈正相关的关系，此时除了父子、师徒技艺密授之外并无知识产权的正式制度设计，因缺乏制度的保护和激励，大多数科技活动和技术发明也还处于自发的、零星的、非盈利的状态。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技术发明和科学发展的进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试验室制度这一科技史上重大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变迁，使得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实现由经验型到试验型的方式转变；二是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它往往不仅要考虑市场、盈利、成本等一系列的影响因素，而且开始走上了技术产业化发展之路。随着科技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明创造社会职业的出现，要求供给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使科技从业人员的私人收益率不断提升趋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产权保护体系。

（三）以意识形态为价值判断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延滞

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钱文源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和国家疆域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虽然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是排斥异说的，但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欧洲却与东方中国的情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欧洲的教会与教会、政府与政府、教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诉求和竞争，因此对新思想的排斥往往并非总是那么有效的；另一方面，在国家疆域上欧洲许多封建的独立政权的存在，也使科学的发展留有空间。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却被一种基于绝对政治权威的主导意识形态体制所统治，任何有关不同体制问题的公开讨论均在严厉禁止之列，而且国家疆域的辽阔与统一也使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异端意识形态难以有回旋的余地。因此，中国人虽然在机械技艺方面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但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障碍仍然使得他们难以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做出直接的、显著的贡献。

中国传统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一致性是通过统治者推崇主导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尤其是儒家学说的传播和科举制度的实施。根据林毅夫的分析，抑制了中国科学革命的因素并非科举制度本身，而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有其激励结构^①。在激励结构方面，中国传统社会鼓励有才华的人进入官僚体制。与西方的世袭封建贵族统治不同，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实现统一之后构建了强大的官僚体制以掌控政权，隋朝更是创立了科举制度用来选拔官员，国家也对应试及第的人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厚待遇，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使读书人根深蒂固地产生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政府任职成为最荣耀、最有利的

^① 在此处，林毅夫先生的本意应是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人才选拔是好的，关键是这种选拔机制的设计是否合理和有效。请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68-270。

职业而受到读书人的追捧，这种强大的激励效应使有才华的人热衷于谋求一官半职而不屑于投身科技活动，并常常将科技的进步斥为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在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方面，以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参加科考的人必须将多达43万字的《四书》、《五经》烂记于胸，还必须谙熟篇幅数倍于原文的各种经典注解，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遍览经、史、子、集的经典文献以提高其巧做诗文的应试能力。如此浩繁的诵读典籍使读书人皓首穷经而无暇他顾，泯灭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致和创造才能，终致中国传统社会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才缺乏。由此可见，在获得现代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方面，与当时西方的同代人比起来，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天才们受到的激励要少一些，这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追求不无关系。

二、中国改革：制度的收益与绩效

林毅夫指出：“生产增长的潜力是否能够被挖掘，除了是否发生技术变迁以外，还在于是否有配套的制度作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正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通过供给和变迁来挖掘增长潜力进而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因此，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预期通过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来推动经济增长绩效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建设发展，虽然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维持了低绩效状态下的稳定，但其固有的弊端和缺陷却日益显现，中国改革已经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内生需求。正是由于对经济落后状态的强烈感受，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对经济增长的绩效，邓小平的“猫论”就是最好的印证，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事实上，中国改革带来的制度绩效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美国从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蒂莫西·耶格尔（Timothy J. Yeager）所说：“近年来，中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正式经济体制上的变革是其发展的最大原因。中国现今的历史是说明国家体制框架对经济表现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出色的例子。”然而，中国改革又是如何通过制度变迁产生绩效的呢？在此我们将运用制度绩效理论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考察和分析。

（一）路径依赖：中国改革的渐进式变迁与经济增长绩效

中国改革走什么样路径，将对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改革的绩效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中国的改革是走突变式之路，还是走渐进式之路呢？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有利于增进绩效，他指出：“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不去追溯制度的渐进性深化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今日的选择。”这就是说，今天的制度选择应该是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发展，改革不可能完全割裂历史。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建设发展，已经为中国开启改革之路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和经济必要条件，此时，需要寻找历史的一个新的起点。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正是契合了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放弃了“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而选择渐进式变迁之路，才有幸成为世界范围内制度革新的成功典范。改革开

放推行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条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表明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遵循了渐进式演变的道路。在政府主导下，中国改革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由易到难地稳步推进，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路径，使改革的经济社会综合绩效得以不断增进和扩大。渐进式演进使改革的领域、地域、范围稳步地推进和深入，通过带动效应、稳定效应、实验效应的传递，有效地降低了风险成本。这种“渐进式改革较好地协调和平衡了各种利益关系和经济关系，避免了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中矛盾的激化，维持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从而降低了改革成本，提高了改革收益。”

（二）交易成本：中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与经济增长绩效

交易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交易的繁荣。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和重要分析工具。无论是科斯（Ronald H. Coase）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的划分，还是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事前交易成本、事后交易成本的界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交易成本的存在及其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科斯定理认为，只有零交易成本才可能带来最好的绩效，但这种理想境界通常情形下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的环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那么，哪种体制更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呢？耶格尔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激励因素来对经济组织体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改进”，但是“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这点”。正是由于对经济组织的激励作用并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改革的最佳体制选择。

中国改革实质上是一个不断走向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地摸索才最后确定下来的。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的选择方面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历程。直到1992年中国才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在当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色和要求。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交易成本来源于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交易主体的有限性。那么，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就是要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从而提高交易主体的理性判断，降低交易成本。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首先，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使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被扭曲的情形已经发生很大的改观；其次，已经建立和发展了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商品市场日益丰富和专业化，而且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也日趋规范和有序；再次，通过完善法律体制、建立市场秩序、提高交易公开度，较为有效地规范了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了良好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

虽然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然而由于“经济人”利己性的存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也必然伴随着管理失范（如随意罚款）、寻租、腐败等增加交易成本的现

象。根据耶格尔的观点,高额交易成本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腐败和“关系”^①这两个因素从不同程度推高了交易成本。在此,通过对“关系”的分析我们即可窥见其对绩效影响之深之大。在中国,“关系”是一种非正式体制,是一种人们偏好的政商沟通方式,人们期望通过与个人发展私人朋友关系谋求规则和法律之外的利益。虽说“关系”在某种情形下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其更容易滋生腐败、歧视和秘密交易,进而导致低效率和高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关系”日益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障碍,对以契约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来说,“关系”是一种令人沮丧、导致交易成本高昂的体制。因此,必须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化解这种推高交易成本的不公平现象,尤其要注重程序上的公平。因为“内含程序公平的社会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加社会公众的剩余,鼓励社会的生产性努力倾向”。

(三) 产权激励: 中国改革的产权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绩效

根据诺思的观点,产权制度安排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中国改革使产权结构安排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宏观产权结构变迁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许多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控制,经济权力的分散和利润分摊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另一方面,微观层面的产权制度变革激励了经营主体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国有企业的改制、个私企业及公民的产权保护、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都极大地活跃了生产经营活动。

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意义具有代表性,下面就此进行简要阐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发展的轨迹,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一个成功案例。自从1956年年底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集体生产便基本成为中国农业唯一的生产组织方式,但长期以来这种集体生产因缺乏产权激励而导致经济绩效的低下,甚至威胁到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没有正规的制度变革的情况下,一些贫瘠地区的农民私下开始了自发的行动,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为代表的变革开始在农村蔓延,引发中国经历了一场刘易斯式的“农业革命”。农地产权制度这种自发性变迁减少了因抵制带来的绩效损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地位和对农地的部分产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不排除由于长期的农村基本水利建设等因素对农村经济增长绩效的贡献,但农地产权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绩效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有关经济学者的粗略估算,中国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贡献份额在20%~50%,甚至有的学者估计高达70%,这说明私人土地制度和公共土地制度的差异导致生产率的差异巨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并在整体上不断推进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解决。总之,1978年以来的农地制度安排引起了农业耕作、经营方式和土地关系等许多方面的变革,促使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最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① 其实腐败和寻租已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于“关系”之中。

(四) 制度红利：在改革中前行的中国经济与社会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全球影响力稳步提升。从内部纵向比较来看，中国的 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 3 645 亿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519 322 亿元，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381 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38 354 元；从外部纵向比较来看，中国不仅在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当前已取代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贡献率最高的国家，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更是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引擎。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实现了显著的提高，其中必定包含了制度变革带来的红利。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不断通过制度变革推动经济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表 1 改革前后中国经济绩效比较 单位：%

项 目	1952 ~ 1977 年	1978 ~ 2009 年	前后差异
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5.74	9.4	64
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2.3	6.9	20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2.5	8.7	248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	1.1	6.4	482
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	2.2	8.1	268

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吗，还能持续多久呢？林毅夫为我们勾画出美好的蓝图，他认为中国仍有维持 20 年 8% 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有望在 20 年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他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还需要发挥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可见，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抱着乐观态度的同时，也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通过不断的改进制度安排使其得以解决或缓解。在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很可能是较优的、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安排就是不可改变的、是一劳永逸的，经常的情况应是，制度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补，不断地量变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制度的边际效用不至于下降”。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制度僵化，并不断从制度变迁中获取红利，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改革走到历史的今天，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点。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加快改革以提高“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改革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改革也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改革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因此，与改革之初相比，当前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我们必须谨防“改革疲劳症”，防止因激化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矛盾降低改革的绩效，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前行。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渐进式改革也必然要触及“深水区”，也

必须面临对某些原有的长期利益格局进行“破题”。因此，改革不能在深层次的领域之外裹足不前，应该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必须寻找制度的薄弱环节，发现改革的着力点。虽然户籍人口、收入分配、农地产权、企业经营、税收金融等许多经济领域亟待制度创新，但当前政治体制的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根本和艰巨，面临着更多的变量困扰。制度的运行有一个整体效应，在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也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与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生产性活动的激励机制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则更多地偏向于对公共权利的约束。一方面，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腐败，降低腐败给经济增长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结束语

诺思运用制度绩效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我们也可借此探究中国经济在传统社会长期停滞而改革以来实现超越的缘由，通过对历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和现实中的“中国改革”的制度绩效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或推论如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产权制度安排是生产性激励的核心。有效率的制度应尽可能地激发私人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产权制度使人们不仅在思想上乐于从事生产性活动，并且在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私人收益能够趋近于社会收益。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虽然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它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在根本上的背离，严重地抑制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下，私人产权的边界模糊使得工商业者因缺乏产权的安全感而难以内生出生产性活动的热情，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主张的“学而优则仕”，更是从非正式制度层面上泯灭了自命为精英的读书人对科技创造和生产活动的兴趣。中国改革所创设的一系列产权制度尤其是对农地产权及民企产权的制度安排，无疑显著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过，虽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已被明确写入宪法，但应有更细致、更具操作性的产权制度设计加以落实，要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深层领域的产权改革也势在必行。

第二，制度设计应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从另一种视角上来说便是经济绩效的提升，而且只有当经济绩效超过交易成本时才可能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不仅工商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受到官僚的盘剥难以得到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且更因专卖制度的实施及海外贸易的限制而使得一般工商业者难以获得规模效应。不仅如此，工商业者要得到安全保障或获取专卖权就必须支付贿赂官员、购买专卖权的费用，从而不断推高交易成本，挤压本已微薄的经营利润。市场化取向的中国改革正是期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以增强经济绩效的，并且随着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市场秩序的不断完善，经济绩效的提升也日益得以显现。然而，暗流涌动的“关系”型政商沟通方式也使交易成本不断攀升，从而侵蚀着社会整体的福利，解决之道仍须不断地推进制度的完备，实现由程序公正到实体公正的真正统一。